从《三醉人经纶问答》看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

张 慧

（国际关系学院 日法系，北京 100091）

［摘要］《三醉人经纶问答》是中江兆民对于明治维新成功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如何面对当时的国际关系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即君主立宪、和平外交、与中国交好。该书反映了当时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中江兆民在他的民主理想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判断。中江兆民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法国的卢梭、阿科拉等人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中国的孟子等汉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江兆民；德富苏峰；和平外交；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2-0114-07

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68 年，在日本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在尊王倒幕的运动中终结，明治维新后实现了王政复古，标志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开始。在日本准备要踏上文明之国之路时，在国际关系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自 1853 年佩里叩关以来，幕府政府先后和美、英、俄、荷、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对日本不利的条约，被称为“安政五国条约”。为了去除不平等条约中的对日本不利的条款，为进一步发展谋得更大的空间，明治政府开始准备修订条约，和各国进行交涉。1871-1873 年，明治政府派出了由政府首脑要人组成的岩仓具视使节团出访美国、欧洲，一方面向各缔约国递交国书，并为修改条约与各国进行前期交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对欧美各国的文化文明进行深入的了解与考察，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回国后，针对留守政府的“征韩论”，出访一行人的“内治”派占据了上风，明治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样，日本的经济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持续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使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命运。但同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何扩大市场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一个要务。面对着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势力的不断增加，目睹清政府、朝鲜和亚洲各国的变化，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先是以漂流民被杀为借口出兵台湾，向清政府发起挑衅；后又制造江华岛事件，逐渐地加强对朝鲜的

* 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KYF-2011-T20）的阶段性成果。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控制。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大力扩充军备。此时，日本国内对于日本所处的国际局势和日本今后的走向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舆论，知识界对日本的未来进行着各自的思考。1884年《自由新闻》上连续发表《国权扩张论》，1885年福泽渝吉更是在著名的《脱亚论》中提出了“脱其伍（指清朝与朝鲜）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同进退……随从西洋人对其办法处置”[1]（P.221-224）的说法。1886年，青年的德富苏峰从平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发表了《将来之日本》，在其中提出了对“腕力世界”的批判，主张用“和平主义”代替“武备主义”。另外还有一位明治时期的著名评论家中江兆民于1887年发表了《三醉人经纶问答》，在文中对“民主主义”和“扩张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他认为的更为符合日本当时情况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应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已经就当时的国际关系展开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思考，对于解决日本的外交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特别是《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被称为是明治时期文学史上之杰作，同时也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田中明彦认为，此书与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构成了日本国际政治学领域最早的一场思想争论。[2](P.3-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后日本的发展之道路对比来看，恰如中江兆民为其后百多年的日本历史所做出的预言，并且他在此书中所表达的小国主义的外交思想对今日的日本对外政策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3](P.3-4)

二、中江兆民与《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江兆民（1847-1901），本名中江笃助，明治时期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喜爱读书，性格温厚。15岁时进入藩校文武馆学习洋学（英学、兰学）、朱子学，19岁至长崎学习英学，后改学法兰西学，曾担任过法国公使的翻译。1871年，随同岩仓俱视使节团出行，前往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主要涉猎的内容有法律、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兆民先在里昂学习法律，并在这里接触到了共和主义。后又回到巴黎，期间跟随爱米尔·阿克拉，开始深入地学习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法国留学期间，中江兆民“深崇奉民主共和，忌阶级如蛇蝎，恶贵族如仇敌”，曾亲眼目睹法国巴黎公社覆灭后的混乱局势，看到了革命中的人民所处的境地。1874年，回到日本。不久即翻译完成了卢梭的《民约论》。回国后于1875年开办“法兰西学舍”，很快这里便成为宣传和普及法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据点。1875年后的两年内，兆民曾担任过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因其主张传授“孔孟之道”未获批准而辞职。后又担任元老院权少书记官，也因与陆奥宗光意见不合而退职。以后他专心从事翻译、评论、著书等，翻译有《民约译解》、《维氏美学》、《理学钩玄》及大量的法律相关书籍，曾任《东洋自由新闻》主笔，《东云新闻》主笔。以笔作为武器来宣传民主思想，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被称做“东洋的卢梭”。1887年发表了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成为“明治思想文学史上的最高杰作之一”。1901年被诊断患上癌症后，执笔写下《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成为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哲学的不朽杰作。

《三醉人经纶问答》发表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该书采用问答体的形式，安排代表不同思想的三个人物：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扩张主义者豪杰君和现实主义者南海先生登场，用三人之间的对谈来展现出当时颇受人们关注的不同倾向的几种观点。洋学绅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的民权思想者，他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民主制度下自由得到保障，文化学问得到发展，国家可以成为文明之国。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即使大力发展军事，也无异于以卵击石；且快速的军备扩充只会招来经济上的困顿。所以只要以文明、道义为武器就好。对于侵略，洋学绅士的立场是非暴力、不抵抗的绝对和平主义。好战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豪杰君则代表了当时越来越抬头的国权主义的思想，认为日本作为一小国，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战争，要发展军备，要将目光投向周围邻国。提出了放弃日本、向中国转移的强盗般的想法。豪杰君希望把“怀旧”势力转移到中国，将“喜新”势力留在日本，以发展民主。在听完两人意见后，南海先生点评道，洋学绅士过于理想，而豪杰君的想法有些过时，都不可能实现。两人共同的问题是对形势的过于忧虑，因而两种选择都无益于当时的日本。对于当时的日本，南海先生的设想是，以君主立宪制来治内，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与中国交好，以保证日本经济的大市场。从篇章构成上来，洋学绅士的思想理论所占篇幅最多，豪杰君的思想陈述应该是最少的。

关于此书所表达的思想，德富苏峰于 1896 年曾评论说，是“兆民的抒情诗”，三个醉人分别都是“兆民居士的一分身”，“欲知君之本领，无若此书也”。[4](P.399) 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着直到今天的中江兆民的研究。正如德富苏峰所言，这本书反映了中江兆民思想中的不同要素之间的斗争。然而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此书中的南海先生所表达的观点，才应该是在当时面对着国内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江兆民所给出的一个适合于当时明治政府的富有和平思想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个解决方案终究未被采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权主义越来越占据了思想的阵地，并且从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正式走上了向亚洲扩张的帝国主义的道路。

三、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观

（一）关于日本的国内体制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出版之前，正是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大批关于民权的翻译书籍和著作的出版起到了启蒙和宣传的作用，要求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的呼声高涨。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宣传者，并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主革命的中江兆民在这样的时间点，对于当时的日本政体提出了自己想法——建立君主立宪制。

中江兆民借洋学绅士之口首先描绘出民主制是尽善尽美的，具有进步性，“必须进而获得平等的大义，才能算获得巨大成功”。[5](P.18) “立宪制不坏。民主制好！立宪制是春天，还有些霜雪的气息，民主制是夏天，不再有霜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立宪是贤者，民主是圣人。用印度的话来说：民主是如来，立宪是菩萨”。[5](P.19) 但洋学绅士也注意到民主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指出民主制虽合理却难实行，“除非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风俗已经完美，不然，民主制度只能导致混乱”；[5](P.23) 民主制国家的总统之“威严远逊于帝王，一旦遇有奸雄觊觎篡位，官民解体，全国不免引起混乱”。[5](P.23) 而立宪制中“帝王的职务是世袭的，以此足以镇压野心家，而且又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庶民皆能维持其自由而不致丧失”。“制度必须与民众风俗的高下相适应”。[5](P.23) 洋学绅士认为，只要世界的国家都实施民主制，“尔后联合世界各国组成一个大联邦”，[5](P.26) 就可以停止战争，维护和平。这样的观点，在 19 世纪西方列强纷纷扩张势力范围的局势下，显然是非常理想化的、极易被反驳的。于是豪杰君指出这只是“学者的高论”，难以付诸现实。进而，中江兆民以南海先生的身份对洋学绅士的理想进行了批判，表明自己对日本当下应该选择的政治方向做出的选择。南海先生认为洋学绅士是“用尚未调好的颜料在现在的纸上，描绘未来的图画，那简直近似于颠狂”，[5](P.53) 并预言道“百年之后，其颜料的汁液定会汹涌地充溢于社会这个碟中。于是，那时在现代的纸或绢上，描绘事业的画，那么过去思想的色彩一定鲜艳夺目，观赏者一定会称赞它是凌驾于鲁本斯之上，超过普桑的美术杰作吧”。[5](P.53) 而对于明治初期刚“得到恩赐的民权”的情况下，如果要变为“恢复的民权”，这是“违背事物发展的次序”的。所以“也只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上则伸张皇上的尊严与荣光，下则增加万民的福利”。[5](P.57)

虽然中江兆民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旗手，以大量的翻译作品和政治评论在普通民众间宣传着民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主自由的思想，然而却不赞成激进的革命思想。对于采取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制的另一原因，“东洋的卢梭”中江兆民认为在于“在人们的头脑深处，深刻地印有帝王的思想和公侯的意识，它好像隐隐约约地成了人们的守护神和护身符”。[5](P.52)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涉及天皇之存在的问题上，他持有对皇权的神化和象征化的观点。这样，中江兆民运用了大量篇幅，以绅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又清醒地看到了现实，将民主制的实现冀希望于百年之后，而为明治时期的日本选择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为自己则选择了“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民主思想的）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5](P.52) 的道路。

（二）关于日本的对外关系

1. 对西方各国势力的态度

19 世纪末，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英法德俄美已纷纷开始向亚非世界伸出掠夺之手。中江兆民看到，英国占有了印度，并不遗余力地继续在侵略亚非;法国割取阿尔尔及利亚、越南等等，“无不是侵占他国土地，采取既定的政策，为自国货物打开销路”，对于欧洲各国这样的做法，洋学绅士认为“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应该“努力自守，以求得自给自足”。[5](P.21) 这时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自安政五国条约时期以来有了不小的提高。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有着深深的危机意识和小国意识。对于西方国家的殖民行为，中江兆民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5](P.27) 中江兆民以一串精妙的比喻将当时的国际形势描绘成一幅狂人图。[5](P.27-28) 对于西方各国的竞相扩充军备，他认为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对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中江兆民认为，普法之争意在夺取军事名声，而英国之意在于维护自己的领地，只有俄国如古罗马，有开拓新的领地之意。而想要染指亚洲的俄国与已在亚洲有殖民地的英国之间又互成牵制。

2. 中江兆民的战争观

对于欧洲各国的不断扩充军备、在亚非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洋学绅士和豪杰君都表示出了高度的警觉。不同的是理想的洋学绅士吸收了欧洲和平思想，特别是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对于这样的不太平的局势，从日本的小国立场出发，采取了彻底的不武装的态度，要以民主制度、以道义外交来面对外来的侵略，所谓“挥剑斩风”。希望通过全世界都建立起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建立起世界国家，来谋求永久的和平。日本作为一后进小国，应该建立起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向大国夸示；拆除城堡，撤销军备，以“道义”向他国以示友好之意；努力自守，以期实现自给自足。无疑，这样的想法在豪杰君看来，就是哲学思想在蒙蔽人心。以征战为乐的豪杰君认为西方列强的军备竞争一旦破裂，必将祸及亚洲。认为战争是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事，是衡量一国之文明程度的“体温计”。日本作为一小国，要想进入文明国之列，只有靠对外侵略才能真正实现富强，进入大国行列。并且中国此时疲弱无力，正是侵伐的大好时机，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5](P.35)

对于洋学绅士彻底的不武装说以及豪杰君的对外扩张说，南海先生认为都是出于二者对于局势的“过虑”。西方各国实力相当，互相制衡，这样国际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况且西方国家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政策决定也不是由一人而定。因此“狰狞的虎狮终年只能张嘴吐舌，不能随意咬人”。[5](P.55)

3. 亚洲的日本与中国

19 世纪末的亚洲，已经成为西方列强争相抢夺的对象。明治维新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各国之中最先实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对于这时期日本在国际中的地位提高这一不争的事实，中江兆民说“在文明浪潮中居于后进的一个小国，从亚洲的边陲昂首崛起，一跃而进入自由友爱的境地”，[5](P.3) 认为日本这个“神童”未来不可估量。这是中江兆民在跟随岩仓具视出访欧美时对于当时被欧洲国家视为文明“未开化”之国的回应，表明在这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时期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有了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日本希望真正跻身于所谓文明国家之列的强烈愿望。

对于这时的中国，日本的认识更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71年,明治政府与清政府签订《日清友好条约》，至此彻底地摆脱了过去的传统“中华帝国”的体系，实现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学问之师的中国如今在西方列强的染指下失去了老大帝国的地位，成为列强争抢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洋学绅士的态度是惋惜的，这从在狂人图中的中国被描述成为反应迟缓、不采取行动的被动形象可以看出。而在经济处于扩张时期的日本，豪杰君的论调则代表了当时国权主义者的意见，他们希望能夺取之“以自富自强”，从而与英法俄德等相比肩。不管是绅士君，还是豪杰君，都认为此时的中国已不可与日本同日而语，都抱有着一种强烈的优势心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这样的一个曾经的老大帝国，绅士君的态度是感慨，而豪杰君就表现出了占为己有的野心。

针对二者对中国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南海先生提出了中江兆民的对华政策的建议——两国同处亚洲，作为亚洲一小国的日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5](P.56)虽然豪杰君认为中国“军队软弱”，“易于征服”，但南海先生认为清朝的执政掌权者们“全是贤俊之才”，重视海陆军备，有丰富的资源，购买欧洲文明成果，仿效欧洲列强之法，增加舰船，筑起堡垒，如果能再接受西方欧洲文明的精神，“垂危的枯槁老者，顿时改变颜色，其枝叶葱葱然，再次把树荫展向四方”。这里所表达出的中江兆民对于中国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西方文明，重新再度复兴，然后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欧洲列强的友邻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对清政府越来越不利的国际地位颇为关注，其中既有国权主义者的关注，也有民权主义者的关注。作为民权主义的宣传者，中江兆民在此时期也与一些国权团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比如1884年曾参与在东洋学馆的设立工作；在朝鲜甲申事变结束后，曾参与头山满的玄洋社在朝鲜设立“善邻馆”的计划，但此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有些观点认为中江兆民在此文中的扩张主义者豪杰君的观点就是后来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先驱，但从这一时期兆民的言论来看，他参与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在于希望将自己的自由民权的理想向这些国家进行启蒙开化，并没有支持帝国主义扩张的立场。然而，随着日本的国权主义的不断抬头，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所谓“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实，使得日本不少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国权主义，例如原来的平民主义者德富苏峰。1900年中江兆民不顾弟子幸德秋水的反对，参与结社国民同盟会，并担任了“扩张委员”的职务。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三）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之构成——东洋的卢梭

少年时期的汉学基础和青年时期的法国留学经验对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洋的卢梭”这一称号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国际政治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西方思想和东方素养。像中江兆民这样出生于幕府末期的一代知识人，近世的儒学教养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明治时期，他们又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参与到明治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以西学思想为明治时期的资本主义进程、自由民主进程做着思想动员。

首先，中江兆民深受孟子思想影响。作为民权运动者的他的民权思想的形成就离不开对儒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中江兆民曾写有“民为重”的匾额，这显然是受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影响。留法期间，中江兆民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同时还从事将《孟子》翻译为法语的工作。另外，回到日本后，中江兆民还以汉文体的《民约译解》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行翻译与解释。《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还有与不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少孟子思想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孟子思想的体现。洋学绅士在分析君主制度时提到，君臣之义是这种社会制度得以维系的“无形的东西”，“这就是君对下施以慈爱之心，民对上报以感恩之心。因此，在上者慈爱之心和居下者感恩之心其份量越多，君臣之义则越重，上下的关系则越紧固”。[5](P.12) 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P.322) 南海先生在最后谈及如果西方列强他日悍然来犯时，认为“他不义，我是正义”，定可以自卫；“如果最终不能抵挡欧洲的士兵，此时，绅士君所说的民主国，豪杰君鼓吹的新大国，只能任其陷落而已”。[5](P.55) 以仁义为立场，进行自守的防卫观念与孟子对于滕文公之小国立国之策时的回答“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6](P.95) 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兆民留法期间，曾跟随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阿科拉学习，接触到了卢梭以及 18 世纪西方的很多政治思想。他这些思想都投影在了《三醉人经纶问答》之中，并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些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洋学绅士的建立民主制，以促进和平的世界联合的想法就融入了从他对圣彼埃尔、卢梭和康德的和平论点的理解，从他对这些思想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贯穿于其中的还是民权、民本主义的思想：战争对于帝王来说，是其争名逐利的一种手段，而对于人民来说，战争只是一场灾祸，“作为人民，岂有自己喜好发动战争的道理”。这一点恰恰在豪杰君的战争描述中也得以体现：“如不能取胜，则以一死而留骁勇之名于后世。这是大将之乐也”，[5](P.34) 战争之所以发，全在于武夫之乐，武夫之名。中江兆民在这里十分明晰并且富有预见性地为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的原因给出了解释。至于国家在选择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时，中江兆民认为也应该将国民放在第一位考虑。南海先生在批判洋学绅士的理想民主制时谈到了政治的本质，“遵循国民的意向，符合国民的知识水平，使之安居乐业，获得福利”。[5](P.51) 民主制虽然美好，但当时日本国民刚从幕府的专制制度下得以解脱，得到了“恩赐的民权”，如果一下子要取得“恢复的民权”，以当时民众的思想状况恐怕会引起进一步的混乱。所以，以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理想的中江兆民还是为当时的日本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这个更符合当时局势的一种妥协的民主。最后，南海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外交观点时再次强调了外交的前提，“总之，外交的良策是：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5](P.57) 这样，民权和民本的思想在此书中也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这一点既来源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来源于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此外，中江兆民在法国留学期间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惨烈，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

前面提到，中江兆民在法国求学期间，曾跟随阿科拉学习，深受其影响。在关于国际公法的作用这一点上，中江兆民在阿科拉的观点上加入了自己的理解。阿科拉认为，由于没有相应的执行司法部门，国际公法不应被列入法律的范畴；而其能否得到履行，完全是“人们的良心问题”。然而对于国际局势的秩序如何得以维持、日本何以自保这一点，中江兆民虽然对国际公法的认识是出于阿科拉的观点，但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国际公法在避免战争发生时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各国外交重实力不重道德，然而在势力均衡的条件下，法德两国扩军备战，英俄互成牵制，“四个国家强弱之势大体相当，因此它们不得不遵守几分国际公法。这就是各小国赖以避免遭吞并之患的原因所在”。[5](P.54)

中江兆民思想的双重性特点在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福泽渝吉、加藤弘之、西周等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都是如此。佐藤弘夫指出，日本的近代就是在对西方进行学习接收中成立的，这一点在整个明治思想之中都有所体现。明治思想的特质正是在于具有西方思想和传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统思想这样的双重构造。[7](P.219)

四、结论

一百多年前，中江兆民写下《三醉人经纶问答》，为的是给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的虎视中确保本国的独立自主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从此书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明治思想界中所进行着的斗争，还能看出中江兆民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的环境之间的斗争。

兆民提出的方案只有君主立宪制在1889年的明治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战争是源于交战国的神经病，但并没有指出这神经病后真正的原因。日本最终走上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这当然和日本的国权主义的抬头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对于战争的一些判断还是预言到了战争的爆发的条件——“天子宰相独断专行”[5](P.49)，军国主义势力。针对当时以福泽渝吉所主张的“脱亚论”,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提出的以亚洲与欧洲相抵挡，与中国“对为兄弟邻邦”的建议虽然在当时未能牵制住扩张主义的步伐，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从亚洲的外交格局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兆民的外交思想的生命力。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依然能够读解出符合今日的时代意义。

应该说，中江兆民的思想是我们了解明治时期日本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切入点,《三醉人经纶问答》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了明治时期日本知识界对于日本前途的思考，其中所表达出的国际政治思考对今天的日本依然发挥着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日]福沢諭吉.脱亜論[A].富田正文,土橋俊一.福沢諭吉選集(第七卷)[C].東京：岩波書店，1989.

[2] [日]田中明彦.日本の国際政治学——「棲み分け」を超えて[A].日本国際政治学会.日本の国際政治学 1.学としての国際政治[C].東京：有斐閣，2009.

[3] 唐永亮.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 日本近代小国外交思想的源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日]松永昌三.中江兆民集[Z].東京：筑摩書房，1974.

[5] [日]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M].滕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一)[Z].上海：上海书店，1986.

[7] [日]佐藤弘夫.概説日本思想史[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

（责任编辑　齐琳）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